

#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周边安全战略评析

刘海泉

---

**摘要：**在毛泽东时代，赢得稳定的周边环境至关重要。毛泽东时代的周边安全战略思想内容丰富，一是对当时的战略环境的判断，二是对不同阶段的周边安全策略的选择，三是不同阶段周边安全策略的共同点以及当代价值。

**关键词：**毛泽东时代；周边；安全战略

**作者简介：**刘海泉，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人文社科部讲师，博士（上海 201620）

---

新中国建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干涉，维护国家主权、民族独立的斗争中把中国的具体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确立和发展了以和平为宗旨、独立自主的、独具特色的中国周边安全战略，为中国在激烈动荡的国际环境中站稳脚跟，为社会主义建设赢得有利的周边条件。

## 一、毛泽东时代的战略环境判断

毛泽东时代既是一个充满战争硝烟和革命激情的时代，又是新中国进行大规模和平建设的年代。在毛泽东的时代观中，这两种思想是交替出现的，在不同时期的主旋律有所不同，但毛泽东更多还是受到经典作家观点的影响，即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战争引起革命。所以，中国领导人认为总体上，这一时期是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时代，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

### 1. 战争危险与和平建设并存（1949年~20世纪60年代中期）

新中国成立之前，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当时形势的认识是基于经典作家的观点的影响，认为当时的时代处于“利用帝国主义战争，是世界革命的前夜”。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虽然发生了朝鲜战争等局部战争，但广大的亚非拉国家纷纷在本国掀起了民族解放独立的浪潮，推动了革命形势不断成熟。二战后，世界各国，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利用这一和平时期加紧进行建设。所以这一阶段是战争与和平建设并存的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没有像经典作家所设想的那样资本主义总崩溃的局面，但战争后出现了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严重对峙，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世界性大战的发生。1950年6月，毛泽东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前夕指出：“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同时，新生的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相对于战争与革命而言，中国领导集体对世界和平充满了信心，1957年初，周恩来指出，世界总的趋势是走向和缓，走向进步的。

当然中国努力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不意味着中国害怕或回避战争。中国领导人主张，中国人民不要战争，但是也不害怕战争，如果战争不可避免，伟大的中国人民就“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以此保卫国家安全。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世界影响与国际评价研究”（12CKS009）

## 2. 重归“战争与革命”的判断(20世纪60年代中期~1978年)

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国内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促使中国领导人从过去争取为现代化建设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转变为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期望中国的新革命能引发世界革命的新高潮。第二,中国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开始面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威胁,苏联增加了对中国北部边境的军事威胁,美国在越南扩大了侵略战争。而且印度在中国西南边境挑起边界摩擦,这使得中国处在三面受敌的境地,促使中国领导人延续了过去那种战争危险依然存在思想,并且现在有了更加紧迫感。这些使得中国领导人对于时代主题判断重新回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战争与革命”。

由于感到战争的危险更加迫近与现实,中国一方面把大规模的备战提到最重要的地位,取代了前一阶段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去发展经济和提高国家实力的任务。1965年4月14日中央下发65208号文件,要求对小、中、大打都要做好准备,各地全面进行了战备工作,兴建了防空洞等各种备战措施。1972年,毛泽东提出“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希望能有一个新的世界革命高潮来缓解中国所面临的战争压力,实现革命制止战争的目的。

## 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周边安全战略选择

在冷战的大背景下,中国周边安全战略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双边关系。此外,由于周边邻国众多的地缘特点,中国在制定周边安全战略上还需要维护好与邻国的关系。

### 1. 20世纪50年代的“一边倒”策略

新中国成立正值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抗升级,国际战略环境异常严峻和复杂。美国为推行遏制共产主义、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推行对华敌视政策,在远东地区大肆拼凑反华同盟体系,对新中国进行战略包围和遏制,形成安全上的压力。面临这种特殊的国际安全环境,新中国将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视为核心安全利益,将来自东方的威胁重点防范,此时维护国家周边安全几乎被等同于确保政治安全、军事安全。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采取了“一边倒”的周边安全策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写道:“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不但中国,全世界也一样,不是倒向帝国主义,就是倒向社会主义,绝无例外,中立是伪装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其基本特点是中苏结盟,共同反美。

同时,中国将坚持独立自主作为周边安全战略的基本立足点。但实际上中国与苏联的关系还是一种不平等关系。中国坚持“一边倒”策略,自然会限制和平共处原则的适用范围,也必然会制约中国“独立自主”的倾向。所以,独立自主仅仅是对具有局限性的“一边倒”策略选择进行某种调整和补充。

### 2. 20世纪60年代的“反帝反修”对抗策略

20世纪60年代,由于中苏关系恶化,导致中国同时面临美苏的战略与军事压力,陷入了建国以来最严峻的周边安全处境,北部与苏联处于剑拔弩张的战争边缘,南部大规模援越抗美,西部与印度关系未能缓和,面临着边界冲突升级的威胁,东部需要警惕台湾的动向。因此在周边安全战略上不得不“应付四面八方”。为了维护自身周边安全与国家利益,中国制定了“反帝反修”、“两个拳头打人”的周边安全策略,并在策略中凸显了政治安全的重要性。

这一阶段,美国继续推行对华敌视政策,支持台湾蒋介石集团,逐步升级越南战争。而苏联从中国最好的朋友,变成最危险的敌人。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两党产生分歧,两国关系逐渐恶化。60年代前期,中国将合法性以及维护意识形态权威性视为维护国家周边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在分析中苏论战时指出:“我们同赫鲁晓夫的斗争是阶级斗争,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要准备可能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有一场斗争,也可能斗争很激烈。”这种政治分歧的扩大最终导致中苏严重

军事对峙与边境冲突,60年代中后期,维护国家军事安全成为当时国家周边安全战略的压倒性目标。1969年7月,叶剑英等几位老帅在呈送毛泽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在当时的战略形势下,苏联构成的威胁已经超过了美国。面对美苏的安全威胁,中国领导人制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毛泽东一方面号召“要准备打仗”,谨防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侵略战争;另一方面要求全国上下抢时间、争速度,全面加强国防建设。虽然取得了“两弹一星”的辉煌成就,增强了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能力,但也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

### 3. 20世纪70年代的联美抗苏“一条线”策略

“反帝反修”的周边安全策略并没有有效改善中国的周边安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对周边安全战略进行调整,确立了以联美抗苏为基本特征的“一条线,一大片”的周边安全策略,但这一阶段中国周边安全策略的重心仍然是维护国家军事安全。

20世纪70年代,苏联扩张主义势头强劲,视中国为其世界和亚洲霸权政策的巨大障碍和主要敌人,一方面,在中苏边境屯兵百万的基础上,又发出核战争恐吓,向中国施加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加紧从西、南、北三面构筑反华包围圈。周边局势促使中国认定“苏联霸权主义是当代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而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表现出收缩亚太战略的趋向,对华方面也逐步形成“联华遏制苏”的战略调整。1969年8月14日,尼克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指出,苏联是更具有侵略性的一方,如果听任中国在一场战争中被摧毁,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面对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历史机遇,毛泽东审时度势,制定了“一条线、一大片”外交政策设想,开始实施联美抗苏的周边安全策略,中美走上了“心照不宣的同盟”<sup>⑩</sup>的道路。

尽管中美关系得以改善,中国对美国仍然有所戒备,毛泽东指出,美帝国主义在侵略越南的战争遭到惨重的失败,但它的侵略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尼克松政府正在推行反革命两手策略,口头上谈和平,实际上却在加紧强化侵越战争,企图用所谓越南战争“越南化”来挽救它必然失败的命运。<sup>⑪</sup>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中国的周边安全重心开始转向防范来自苏联的威胁,既然中国无力同时对抗美国与苏联,只能在两个主要的敌人之中选择一个最主要敌人。但由于对来自苏联的威胁估计过于严重,以致国内工作都以备战为中心,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 4.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周边安全环境的持续改善

尽管周边国家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即给予承认,但部分国家基于历史遗留问题,特别是在美国的介入下,对新中国仍然心存观望,对于中国来说,这也是一种相当程度的威胁。对此,在毛泽东时代,中国采取积极姿态,改善周边安全环境。中国外交中一直强调“和平为上”,1953年周恩来总理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第一次完整地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与和平共处。这一原则的提出,改善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打破了美国的包围,同时也消除了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输出革命的担忧。但面对周边国家的民族独立浪潮,中国对于发生世界革命的可能性过于乐观,一度将推进世界革命、实现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作为中国周边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给邻国造成干涉内政的印象,恶化了周边环境。在20世纪60年代,受制于美苏的战略压力,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日趋复杂化。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中国与邻国关系的结构也发生根本变化,与属于西方阵营的日本、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关系实现正常化。同时,为改善周边安全环境,中国对部分邻国承担了巨大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甚至一度超越了当时国力所能承受的极限,与当时中国的国力不相适应。1971~1975年,对外援助占同期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达5.88%,1973年高达6.92%<sup>⑫</sup>,其中对越南援助物质金额最高每年就超过30亿元人民币<sup>⑬</sup>。

针对边界历史遗留问题,中国坚持“在平等、互利、友好的基础上加以解决”的原则,确立了“依据历史、照顾现状”、“在解决之前,维持现状的”基本政策。经过努力,中国在建国初期先后与缅甸、尼泊尔、阿富汗、蒙古、朝鲜等国解决了边界问题,使大部分边界成为双方友好边界。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与周边国家已形成了一套解决争端的完整体系。唯独中印边界问题的交涉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这主要受当时冷战环境的制约和尼赫鲁对华“前进政策”的影响。但和平解决争端并不意味着中国放弃军事手段,相反中国为维护领土统一与主权完整,也主张采取军事手段进行自卫,实现在解决问题之前维持现状的目的。如1962年10

月20日,中国军队对印度的大规模进攻进行了反击,后在1963年2月主动后撤,并释放了印度战俘和归还了武器。

### 三、毛泽东时代的周边安全战略遗产及其当代价值

这一时期的中国周边安全战略呈现出如下特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核心,安全利益是国家最主要的着眼点,经济服从政治,为政治服务。但由于这一时期的跨度比较大,在不同的阶段,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不同,由此所带来周边环境的变化,所以中国的周边安全策略先后经历“一边倒”、“反帝反修”以及“一条线、一大片”的转变过程。在这一时期不同的阶段还是存在一些共同点,这些共同点对维护当代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有着重大指导意义。

#### 1. 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思想

无论是面对建国初期的美国,还是中苏关系分裂后的苏联和美国,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认为帝国主义由于其固有的矛盾必然引起世界战争,在对世界形势的分析和认识上,坚持战争与革命的观点。毛泽东指出,各国人民不要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要对帝国主义发动的战争保持高度的警惕,常备不懈。“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每天怕战争,战争来了你有什么办法呢?”<sup>⑤</sup>中国在建国初期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继承了列宁“和平共处”的思想,毛泽东在1949年6月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发表了包含有和平共处思想萌芽的讲话,指出“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sup>⑥</sup>,这一时期针对新中国国家安全的敌强我弱、敌优我劣的实际,中国领导人提出包含了丰富唯物辩证法的积极防御思想,成功解决了维护国家周边安全中的进攻与防御、防守与反击的问题。

此外,当周边国家,特别是周边大国对中国国家安全产生威胁时,毛泽东创造性地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理论运用到国家安全领域,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sup>⑦</sup>。而关于中国领导人这一时期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则是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列宁“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以及世界革命的思想,对周边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给予了道义上、政治上、经济上的支持。

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思想在积极营造稳定周边安全环境的当代中国并没有过时,相反我们还必须积极继承包括毛泽东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特别是和平思想,赋予其新的历史内涵,和平解决当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各种矛盾和争端,避免爆发冲突,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 2. 坚持独立自主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努力改善周边环境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不管国际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始终将国家的独立自主作为维护国家周边安全的重要内容:“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自己处理”,不容许列强再肆行干涉<sup>⑧</sup>。但在这一时期的不同阶段,独立自主的内涵也在不断变化,呈现出多种历史类型:建国初期的表现形式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领袖,中国在许多问题上不得不较多地尊重苏联的意见,这也就影响了中国制定内外政策,如对内照搬苏联模式,对外基于苏联因素的考虑,被迫承认当时一些对中国不平等的条约和协定,主要涉及外蒙古的独立、承认苏联在中国东北和新疆的特权等问题。而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主要表现形式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这一阶段中国的独立自主方面比之前做得更好,开始对苏联的很多做法和意见并不赞成,特别是当苏联试图损害中国国家利益时,中国毫不客气地批评苏联的大国主义以及对国际事务的干涉,1959年中印边境冲突发生后,苏联人曾说:你们中国人何必去争那么一点地方呢?喜马拉雅山下荒无人烟,争那么一小块地方有什么意思?周恩来的回答是:我们不去占人家一寸土地,也不能让人家占我们一寸土地,我们绝不能干那些丧权辱国的事情。<sup>⑨</sup>

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一员,需要兼顾国际合作利益与维持自身的基本身份与尊严,换句话说任何意识形态类型的主权国家无法回避处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问题,尤其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这种如何处理独立自主与周边合作的关系的两难局面就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国力迅速增强,但

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没有改变,依然需要孜孜不倦地去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面对周边地区出现的“中国威胁论”,理论答案可以从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寻找。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同时,并不否定民族国家时代的一些基本国际原则。恩格斯曾说:“由于人们不再生活在罗马帝国那样的世界帝国中,而是生活在那些相互平等的交往并且处在差不多相同的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独立国家所组成的体系中,所以这种要求就很自然地获得了普遍的、超出个别国家范围的性质,而自由和平等也很自然地宣布为人权。”<sup>②</sup>恩格斯虽然并未直接使用独立自主的词汇,但是他显然把民族国家时代的独立平等视为想当然的国际政治现实了。而在具体实践中,当代中国仍然需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与邻为善、与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sup>③</sup>。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改变周边国家“相对收益”的追求,国家相处过程中的“平等互利”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当代中国在独立自主地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应更好地让周边国家受益于中国的发展,受益于中国提供的地区安全公共物品。

### 3. 寻求“均势”结盟,反对霸权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在追求国家周边安全问题上,一般都是按照现实主义的思维方式,即追求“均势”结盟以遏制霸权,先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与苏联结成紧密的政治军事同盟。后来70年代中国又与美国结成准同盟关系。这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应该是首选路径。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国的联盟战略从表面上看是一样的,实际上存在质的差别。与苏联结盟,是一种政治军事联盟,是基于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两根支柱上的。而与美国联合,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结盟关系,是一种统一战线意义的合作,主要基于国家的政治和安全利益,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完全相反的。

从国际关系的历史经验来看,均势政治的主要手段是联盟,即一国将通过结盟用盟国的力量来加强自己对抗霸权国家的力量。但由于这种额外力量在最终发生战争时是可取的,因此联盟实际上便是“潜在的作战集团”<sup>④</sup>。由此可见,以结盟追求均势的路径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它往往是一场大国战争的准备阶段,加剧国际紧张局势,这已得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等诸多史实的充分证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自身角色被严格限定在极化分明的对抗格局之中,如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中国必须无条件地置身于同另一阵营的激烈斗争,以逐渐削弱并战胜资本主义,必须无条件地维护和保持本阵营内部的团结、统一,以壮大阵营自身力量。这种规定性,限制了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灵活性和自由度。

当今世界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仍是和平与发展的主要障碍,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新的表现形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确立了“不结盟”战略,但面对日益复杂多变的周边安全环境,当代中国需要延续毛泽东时代“均势政治”,积极寻求在周边各次区域的“均势盟友”,服务于中国的周边安全利益。与西方传统的现实主义做法不同的是,中国周边安全战略中的“均势政治”是防御性质的。因为在近代史上,中国曾经饱受帝国主义的欺凌,这使中国始终将反对、制止侵略,作为维护国家周边安全的重要内容。而且中国自己也多次重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奉行对外侵略政策。彭德怀曾作过这样的阐释:“(新中国)可否先发制人呢?……我们认为是不可以的。……如果我们……首先打进敌国的领土,那么,我们……就很难取得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谅解,……使我们失去广泛的同情和支持,使敌人获得政治资本,这是得不偿失的。”<sup>⑤</sup>

### 4. 积极建设国防力量,保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安全

面对这一时期复杂的周边安全形势,中国领导人始终非常重视国防建设,实行积极防御战略,强调人民军队是国家独立和完整的坚强柱石,以此来确保新中国的周边安全。毛泽东认为,为了维护国家周边安全,必须建设强大的国防,这是维护新中国安全的最重要前提条件。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指出,我国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在英勇地经过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1950年9月,毛泽东提出“建设现代化国防”的总体设想,要求把实现国防现代化作为总目标,在这一总目标下,努力建设强大的现代化人民军队。同时在这一时期,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国所思考的战争形式以及重心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从20世纪50年代的人民战争到六七十年代的立足于早打、大打人民战争与有限核反击力量相结合的形式。中国在这一时期

国防建设方面进行了不懈努力,在自力更生开展军工科研和生产的基础上,积极采取措施有重点地进行国防服务的重工业建设,由此从常规到非常规,战略到战术,各大兵种的现代国防力量基本建立起来,加强了海空军以及技术兵种的实力,并且在较短的时间内初步建立了完整的国防科研和生产体系,从而为保障中国周边国防与军事安全打下良好基础。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当代中国面临众多周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威胁,部分区域安全热点问题还呈升温之势,因此,保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中国除了贯彻睦邻政策之外,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国防力量建设保卫自己,推动武装力量加速向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转型,这个转型既是国家安全防御所要求的,也是世界军事变革的大势。同时,我们还要发扬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良传统,融合集中人力、财力等资源,加快军事高新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努力提高军事装备的质量效能。

#### 5. 平衡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

在毛泽东时代的周边安全战略中,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是一对密切联系而又极其复杂的关系。说它密切联系,是因为意识形态本身就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而国家利益反过来又维护了意识形态。说其复杂,是因为在这一时期的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有时两者是重合,如中国决定抗美援朝,一方面维护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另一方面维护了中国东北边境的安全。有时两者是充满矛盾,这表现为,一方面,重视意识形态忽视国家利益,如中国在处理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中,存在着向这些国家输出革命的现象,导致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非常紧张,影响了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利益;另一方面,重视国家利益淡化意识形态,如在中美苏战略大三角中,中国不因中苏同属社会主义而放弃自身的主权利益,中国不因中美意识形态水火不相容而放弃走向和解,去应付来自苏联的现实威胁。有时意识形态占主要作用,兼顾国家利益,如中苏冲突是由意识形态引起的,但其中也包含着对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有时国家利益占主要作用,兼顾意识形态,如建国初期中国为了自身安全而选择“一边倒”,这不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但更多地还是考虑中国的国家利益。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这种密切而又复杂的关系,虽然中国在努力平衡,但由于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冷战背景,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还是表现为意识形态优于国家利益。

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的经济全球化,当代中国的对外政策中越来越多的国家利益导向,淡化了意识形态的色彩。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属性决定了维护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因此,当代中国不再需要平衡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而是要将意识形态视为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

#### 6. 受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合纵连横”和“远交近攻”的安全策略思想使中国领导人在这一时期研究、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方面深受启发。“一边倒”、“一条线、一大片”等周边安全战略中都有其影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和倡导就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同世界所需要的相互尊重的精神创造性地运用在维护国家安全外交实践中的体现。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珍宝岛自卫反击战,都体现了对“有理、有利、有节”的道德的追求,以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防御性的礼治安全的追求。此外,在同周边国家交往中处处体现了中国古代“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思想。这些思想还将继续体现在当代中国的周边安全战略之中。

当然毛泽东时代的周边安全战略也出现过错误方向,如以“世界革命”论指导的20世纪60年代的“两面开弓”周边安全战略,这一战略是中国国内“左”倾思潮在外交上的延续,更多的表现出毛泽东在政治上的自负和他从理想主义出发,追求超出中国实力的所谓“世界革命”,在他看来,中国作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在国际上应该高举打倒“帝、修、反”的大旗,发扬国际主义推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这一战略实施使中国国家利益全面受损,经济上失去了苏联的援助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发展速度慢下来。而中国既要充当世界革命中心,就要花费大量人、财、物支持周边各国的革命;政治上中国同时与两个大国为敌,采取了“以苏划线”的方法,造成中国再一次处于十分孤立的地位,同时与两个大国敌对,使中国国家利益表面上得到维护,而实际上,这一时期是建国后中国最不安全的时期。

总之,毛泽东时代的周边安全战略,具有鲜明的和平主义色彩。实现持久、公正的和平,始终被视为国家最重要的安全诉求。无论是维护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还是积极援助周边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都体现

了这一点,毛泽东提到:“中国是一个正在开始改变面貌的落后国家,经济上、文化上都比西方国家落后。……中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时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的环境”<sup>②</sup>。

注 释:

叶自成:《新中国外交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外交思想比较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1页。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74页,第63-65页。

⑫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31页。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人民日报》1949年7月1日。

李少军《国际战略报告:理论体系、现实挑战与中国的选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585页。

阎明复《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评论》,《百年潮》2009年第5期。

邓小平《邓小平思想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34页。

王绳祖《国际关系史》(第10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359-360页。

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1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第238页。

关于什么是一条线战略,邓小平有一个具体的解释。他指出:“毛主席当时提出的国际战略有当时的历史条件。那时苏联在各方面都占有优势,美国加上西欧都处于劣势,是很大的劣势。我们当时面临的形势是,从美苏力量对比来看,苏占优势,而且张牙舞爪,威胁中国。我们的判断是,苏联处于进攻态势,而且是全球性进攻,战争的危险主要来自于苏联。为了避免战争,毛主席提出了建立从日本经欧洲到美国的‘一条线’战略,以对付苏联的挑战。美国同中国的关系改善了,日本和欧洲同中国的关系也改善了”。参见《邓小平思想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34页。

⑪1972年基辛格给尼克松的报告中提出:“中国人的态度已经从敌手的态度转变为只能被称为一种心照不宣的盟友的态度。”参见 Kissinger to Nixon, “My Trip to Peking”, June 19-23, 1972. Box 851, NSF, NPM, pp.2.

⑬石林《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68页。

⑭邓礼峰《援越抗美述略》,《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

⑮⑯⑰毛泽东《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297页,第91页,第161页。

⑱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11页。

⑲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65页。

⑳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26页。

㉑郭树勇《论独立自主外交原则对于中国大国成长的久远意义》,赵进军《新中国外交60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3页。

㉒《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6日。

㉓约翰·W·斯帕尼尔《结盟的原因》,威廉·奥尔森《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305页。

㉔彭德怀《彭德怀军事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09页。

## The Comment on China's Peripheral Security Strategy in Mao's Era

LIU Hai-quan

**Abstract:** Getting stabl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is crucial in Mao's era. The article divides the study of China's peripheral security strategy in Mao era into three parts: the first mostly narrates the Chinese collective leadership with Mao Zedong as the core judged then strategic environment; the second cards the peripheral security tactics choice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Mao era; the third analyzes the common ground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the the peripheral security tactic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Mao era.

**Key words:** Mao's era; surrounding; security strategy

(责任编辑:文 一)